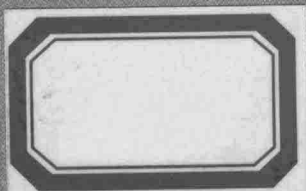


出土简帛与 中国早期藏书研究

傅荣贤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出土简帛与我国早期图书馆研究》的最终结题成果

项目审批号: 09YJA870009

结题证书编号: 2013JXZ0846

◎ 傅荣贤 著

出土简帛与 中国早期藏书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根据出土简帛实物的时代起讫以及中国古代藏书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本书将文题中的所谓“早期”限定在从殷商到魏晋之际。全书以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彼此对读和相互印证为主要研究方法,初步勾勒了中国早期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方面(所谓“藏书”)的基本史实及其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致力于突破“中国”、“早期”本能的时空维度,追问早期藏书的世界意义和现代价值;以及突破“藏书”本能的学科维度,追问早期藏书的文化意味。

责任编辑:许波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傅荣贤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30-2497-6

I. ①出… II. ①傅… III. ①简(考古)—藏书—
图书史—研究—中国 IV. ①G877.04②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1303号



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

CHUTU JIANBO YU ZHONGGUO ZAOQI CANGSHU YANJIU

傅荣贤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80

印 刷: 保定市中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字 数: 370千字

ISBN 978-7-5130-2497-6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xbsun@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20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简帛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四大发现”之一，据我们粗略统计，百年以来出土的简帛总共为24万枚（件）左右，总字数为700万字左右。这一数字是十分惊人的，是原来无法想象的。并且，简帛还将连续不断地出土问世，新发现还往往都是重大发现，例如近些年来在湖南湖北两省的大宗发现就不少：2002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的始建于战国而废弃于秦末的J1号古井中，出土秦代简2万多枚。2003年11月，在湖南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街的J8号古井中，出土汉简万余枚。2003年底至2004年初，在湖南郴州苏仙桥古井群出土吴简140枚和晋简940枚。2004年，在湖南长沙市东牌楼J7号古井出土汉简200多枚。2013年6月开始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进行的发掘，已在古井中出土简牍5000多枚（以汉简为主），此发掘至今仍在进行^①。2000年，在湖北随州孔家坡M8号墓出土汉简785枚。2002年至2003年，在湖北沙市区关沮乡岳桥村印台墓地出土汉简2300余枚，木牍60余方。2006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号汉墓发掘出西汉文景时期简牍2137枚。2007年，在湖北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清河村谢家桥M1号汉墓出土竹简208枚，竹牍3枚。

所以说，一个世纪以来简帛文献的问世，简直就是为我们开启了一座美不胜收的“地下图书馆”。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这是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的至理名言^②。目前，由于简帛出土问世而产生的新兴学科“简帛学”正以其勃勃生机而迅猛发展，考古、历史、思想史、语言、文字、军事史、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但相比之下，简帛学各相关学科发展不太平衡，特别是从图书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值得欣慰的是，傅荣贤教授新近完成的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出土简帛与我国早期图书馆研究》，今易名为“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即将由知识产权

① 这批出土简牍的年代横跨战国晚期至三国吴，其中在9号古井发现的一枚木牍，内容是胡亥继位后的文告，该文告是胡亥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颁布的。文告中“始皇帝”换行顶格书写，这是现今见到的文书中表示尊者（皇帝或当朝名称）换行顶格书写的最早文书实例，极具历史价值。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民国17年。此文另可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傅斯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出版社出版，填补了从图书馆学角度系统研究简帛的空白，实乃可喜可贺！

纵览全书，值得称道者甚多，此仅述其一二：

全书旨在重新梳理中国从殷商至魏晋之际（即本书所谓“早期”）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即本书所谓“藏书”）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作者经过研究认为：迄今有关中国早期藏书的研究成果都是立足于传世文献而得出的，而出土简帛有助于从全面性和准确性的角度补充和订正传世文献的不足，因而能够补充和订正现有成果的缺失和错谬。从这一意义上说，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首先表现在史料的更新和思路的拓展上。例如，根据郭店楚简揭示出战国私人藏书的专题化取向。再如，根据青海上孙家寨出土的西汉晚期军事律令文书木牍，推知西汉张良、韩信《兵法》和杨仆《兵录》在内容性质上都是军事律令的结集。作为结集而成的“一本书”，《兵法》和《兵录》都附有目录，但它们并不是“目录著作”；其所附目录都是勒编成册的一书的篇名目录，而不是“莫之或先”的群书目录，也不是“最早的兵书专科目录”，从而修正了迄今有关《兵法》和《兵录》的若干定论久孚的结论。

在厘清中国早期藏书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作者还致力于对中国早期藏书研究的理论提升，从而将有关中国早期藏书的基本史实纳入到了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精神领域。作者指出，讨论中国早期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特征，可以发现早期藏书不是以客观、冷静的知性法则见长，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趋前、知性分析滞后的学术标准与追求。中国先贤以主体人为思考本位，把人类精神视为文献活动的内在原则，更多地从“为我关系”的角度对文献加以理解和思考，它强调主体人在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中如何能动地改造文献、影响文献、控制文献，使之为主体服务并符合人类的主观需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藏书本质上反映了汉民族的价值理想和天人合一、物我相谐的世界观。而强调文献在内容上对于主体人所具有的某种意义和价值，这和以追求形式化、客观化、标准化为己任的现代图书馆学的学理和旨趣大相径庭，从而有助于反省现代图书馆学的学理结构和技术操作的一般模式。作者的这些研究，无疑对中国早期藏书理论的提升具有实实在在的积极意义。

作者的全部研究是在持守“有朴而后施雕，有质而后运斤”的前提下展开的。如上所述，本书的研究以充分利用出土简帛而构成特色，但作者并未夸大简帛在中国早期藏书研究中的价值。考虑到简帛文献的出土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并且目前出土简帛虽然数量已空前大，但还不足以满足对早期藏书的研究，况且目前有关出土简帛的研究还未完全解决文字释读、残简帛片的拼

复和简序排列等问题。因此，作者坚信出土简帛本身并不能构成中国早期藏书研究的自足材料。事实上，书中有许多结论往往就是直接援引传世文献而入说的。例如，《汉志·书序》“《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下，唐人颜师古注云：“《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峻法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纪·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这里，颜师古明确指出“夫子旧堂壁中”只有一起藏书。关于这“一起”藏书的藏主，颜师古根据自己的见闻记载了不同的“二说”，一为孔腾、一为孔鲋，他们都是孔子的后裔，“二说不同，未知孰是”。但有关藏书史研究专著却割裂文意，故意略去“而《汉纪·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之语，从而误将孔腾、孔鲋两者都视为秦朝的私人藏主，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总之，作者在研究中能始终坚持以公允的态度对待“纸上材料”和“出土材料”，并致力于对两者的充分占有和彼此对读，从而保证了全书史料的坚实和富赡。同时，作者又不盲信材料，而是在对材料作进一步精选识断和辨惑裁定的基础上作历史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确保研究结论与史料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应该说，这种“论从史出”、“言必有据”的学风是十分值得赞赏的。

就藏书研究而言，我们知道，现代图书馆学基本上是根据西方近现代学术规范建立起来的。“西学东渐”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献收集、保存、整理和利用的研究也事实上走上了西方化的、以学科理性为本位的“据外律中”的道路。然而，中国先贤在文献活动中始终将主体人的主观动机和价值理念放在首位，这在出土简帛所见的同书异本、异文、甚至异趣中都有充分反映。就此而言，作者根据中国先贤文献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不是根据预先设定的西方标准来梳理材料，并进一步揭示史料背后一以贯之的精神旨趣，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从清理材料过渡到清理思想”，从而建构了一部既有史实描述又有规律揭示的藏书史研究著作。此外，作者还在中西和古今的比勘中揭橥中国早期藏书的个性特征，并指出西方学理规约下的现代图书馆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并不具有必然的正当性，对它的反省乃至颠覆应成为我们今人的思考取向。应该说，这一基本认知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是记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的，而文献收集、保存、整理和利用的整个过程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的整序和认读过程。因此，积极介入社会文化是中国古代藏书长期一贯的特点。正是有见于此，作者充分结合古代文化的特点，揭示出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一揽子过程是如何适应并支持传统文化，从而以特定的“偏向性”文献行为为社会文化提供现实或观念层面上的依据的。例如，作者从档案和图书两类文献的分野，揭示出秦及



汉初职掌档案的文法吏和职掌图书的“士”的行政地位的消长；从“诗书、百家语”和数术方技类文献的分野揭示出“士”中的文学士和方术士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变迁等等，都为“文化”问题的分析提供了基于“藏书”视角的论证，个中不乏精见。这些从整个文化学角度进行早期藏书研究的新视野新观点，无不使人称道。

泛览全书可知，书中所论都是作者长期研究所得，都是作者从第一手资料中发掘出来的心得体会，这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在世风日下的当今，值得大力褒扬提倡。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甚多，不再一一赘述。尤其是，全书有关中国早期藏书之现代意义和文化价值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充分肯定。不过，不少相关论述和结论只是在行文中直接指呈，而没有用专门的章节予以独立提炼，如能以清晰的序题乃至专门的章节予以提契，必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此“不足”无疑是受制于文题中“中国早期藏书”之限制的结果，这一要求已属有点苛刻了。

荣贤教授曾在我西南大学（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文献所攻读硕士学位，在读期间就显示出非凡的锐敏之气，专业基础扎实，科研能力强，其学位论文得到很高的评价。毕业后一直致力于文献学与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不少，是文献学界图书馆学界的青年才俊，看到他又出新成果，为之高兴。荣贤这本书稿杀青付梓前，属余为之序，我倒是做一些文献学研究，但不懂现代所谓的“图情”，谨写上一点读书体会，与学界分享，聊以充序。

张显成

2013年12月6日于西南大学竭弩斋

前言

本书是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出土简帛与我国早期图书馆研究》的最终结题成果，今易名为《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全书旨在选择能够客观反映中国早期藏书真实情况的出土简帛作为可靠的文献材料，从全面性和准确性的角度补充与纠偏单纯基于传世文献而得出的有关中国早期藏书在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方面的现有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中国早期藏书的原初形态。“勾勒中国早期藏书的原初形态”是本书的最终旨趣，而“运用出土简帛”只是实现旨趣的工具性手段。因此，书中作为“证据”的材料并不局限于出土简帛，而是大量动用到了传世文献。事实上，尽管出土简帛对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材料意义上重视出土简帛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第一方法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帛文献本身可以独立地构成相关研究的自足材料。

首先，简帛文献能否顺利“出土”有很大的偶然性，实际出土的简帛文献也是十分有限的。单纯从简帛出发，难免以偏概全，也很难保证业已出土的文献就是最有价值的材料。例如，迄今出土的简帛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北和中南地区，且主要是私人墓葬中物，官方文献则主要以作为官方办事记录的档案为主，而官府藏书尚无任何发现。又如，从《汉志》等文献记载有关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古文尚书》、《礼古经》、《礼记》、《论语》、《孝经》、《春秋左氏传》，以及《论衡·正说》等文献记载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易》、《礼》、《春秋》的相关论述来看，壁中藏书一度是秦始皇颁布“焚书令”后私人藏书的常见形式，但时至今日已经根本不可能“重见天日”。

其次，简帛的出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已出土的文献也基本上没有经过整理、筛选，往往不是最有价值的材料。并且，由于简帛长期埋于地下或浸在水中，出土时多已残损、散乱、扭曲和变形，有些材料还受到过盗掘的干扰，这些都影响到了简帛文献的学术价值。例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5件木牍，其中只有两片可以断定分别是《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篇名目录和《孙子兵法》中《势》、《九地》、《虚实》、《用间》、《七势》等篇的篇名目录，而其余三片的目录形制已不可缀合还原。

再次，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涉及到书殉笔葬制度，往



往并不是墓主的主动收藏，墓葬所出简帛与墓主生前藏书之间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在古代墓葬中，竹简帛书是比较特殊的随葬品，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同墓主的身份地位没有直接关系，不像棺槨、衣衾和铜器、玉器，可以根据其等级对号入座”^①。

总之，出土简帛是研究中国早期藏书的重要材料，但并不是唯一材料。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先生早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仍是本课题研究所持守的根本原则。

再就文题中的“早期”而言，迄今为止，出土简帛实物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约公元前433年）到魏晋结束之际的公元420年。然而，殷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官府藏书虽然与出土简帛无关，但其时的官府藏书奠定了嗣后中国古代官府藏书的基本形态。因此，文题中所谓“早期”的确切所指，是从殷商到魏晋。

诚然，全书以“勾勒中国早期藏书的原初形态”为最终旨趣。事实上，“勾勒中国早期藏书的原初形态”也构成了全书的主体内容，具体包括：

第一，在史实层面上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还原中国早期藏书之所“是”。

单纯基于传世文献的中国早期藏书研究，堪称缺失频仍。例如，学者们相信，“从文献记载来看，秦代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当有四人，即吕不韦、孔鲋、孔腾、伏生”。而据考古发现，湖北云梦睡虎地、湖北云梦龙岗、湖北沙市周家台、甘肃天水放马滩等地都有秦简出土，它们都是墓主的私人藏书，实际藏书规模并不亚于吕不韦之伦，这就从全面性的角度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又如，清人卢文弨《钟山札记》所谓“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的论断长期为学界所信奉，但长沙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52种病症方剂之“目”却列在该书前面；学者们相信《易经·序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目，“目录之作，莫古于斯”。但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简《曲目》，以及山东银雀山汉简的《孙子兵法》、《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目录都要早于《序卦》。这就从准确性的角度订正了传世文献的错讹。这样，充分利用出土简帛，可以补充单纯基于传世文献的相关研究之不足，有助于从材料的角度对现有有关中国早期藏书研究的基本结论进行拾遗补阙。同时，在拾遗补阙和纠谬订正的基础上，相对全面、准确地建构中国早期藏书的基本内容，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这也再次说明，“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并不是要否认传世文献的基础地位以及否认基于传世文献的全部结论，而只是充分利用出土简帛，对其不全有所补充、对其错讹有所订正。

^①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82



第二，在史实之所“是”的基础上揭示中国早期藏书的发展演变规律。

中国早期藏书研究，虽然研究的是“史”，但并不是“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相关史料的历时性堆砌，而必须揭示其“变化”、“发展”的历史演化过程和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例如，从“巫”到“礼”到“法”的观念变革反映了先秦社会政治秩序的演进轨迹。相应地，掌持文献的文化人也完成了由贞人到史官到官吏的转变，文献的类型也经历了由甲骨卜辞到礼乐文献再到律令档案的转型。具体来说，殷商重“神”，馆员为贞人，文献为甲骨卜辞；西周和春秋重“人”，馆员为礼官，文献为礼书；战国亦重“人”，但馆员有官吏化取向，所掌文献主要为律令文书。显然，从重“神”到重“人”对应于殷周“革命”之际，而从重“礼”到重“法”则对应于“礼坏乐崩”、法制初显的春秋向战国过渡之际。

第三，在史实描述和规律揭示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早期藏书的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

中国早期藏书研究不能停留在“中国”、“早期”的时空范围以及“图书馆”的学科视域内自说自话。局限于“中国”、“早期”的时空范围，只能与古人计短长，而不能释放烛照当代的光芒，更遑论为世界图书馆学研究贡献自己的智慧了。局限于“图书馆”的学科视域，意味着只能在现代西方学术分科的理念下从事纯粹的专业研究。事实上，中国早期藏书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其合法性是建立在对皇权运作的适应与支持的维度之上的。这就需要揭示藏书之外的文化、政治价值。例如，里耶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云梦龙岗秦简等大量法律文书的出土，以及江陵王家台秦简、沙市周家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大量《日书》、历谱等“数术”文献的出土，反映了秦朝的总体文化气象，亦可证秦始皇以“诗书、百家语”为主要对象的焚书举措的社会背景。再就当代意义而言，中国早期藏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将大文化语境和藏书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削弱了纯粹技术的研究，但却以重视思想深度和文化关怀而高标独秀，对现代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不无启迪。

综上，准确概括中国早期藏书的基本史实、演进规律及其多维价值，是本书的全部肆力之所在。然而，有关“中国早期藏书的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方面的内容在行文中虽有揭橥，却没有独立为专门章节予以阐述，导致其文化价值、当代意义方面的内容往往幽隐不彰。此外，书中“早期”以魏晋为下限却每每“延及南北朝”，等等，固然是特定章节语境下的某种“情非得已”，但也说明全书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而这无疑也是笔者未来学术努力的方向之一。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出土简帛在中国早期藏书研究中的价值	1
一、中国早期作为藏书对象的“图书”主要是以简帛为载体的	2
二、作为载体的书写材料携带着丰富的信息内容	4
三、以简帛为载体的“书”可分为图书和档案两大类	7
四、有助于从宏观上认识当时的文献概况和知识体系	9
五、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某些具体知识结构和学术分类	12
六、真实地反映了文献包裹、装帧、庋藏诸方面的具体情况	14
七、真实地反映了文献的流传范围	18
八、真实地反映了古书目录、篇题等附件的形制	20
九、辩证理解出土简帛在早期藏书研究中的价值	22
第二节 利用出土简帛研究中国早期藏书的现状	23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24
二、存在的主要不足	29
三、图书馆学对于简帛文献学的研究的价值	36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的内容、方法和目标	40
一、研究内容	41
二、研究方法	44
三、研究目标	47
第二章 先秦时期的官府文书	49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概说	49
一、由殷商之际的重“神”向西周之际的重“人”转变	50
二、由殷商时期之重“神”到西周、春秋时期之重“礼”	51
三、由西周、春秋时期之重“礼”到战国时期之重“法”	51
第二节 殷商时期的官府文书	54
一、殷墟窖藏甲骨中的“馆员”	55
二、甲骨文献的功能	57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官府文书	60
一、西周史职的分化	61



二、西周宗庙藏书内容的变化	65
三、西周藏书所处的增设	67
第四节 东周时期的官府文书	70
一、东周史职的分化	70
二、专职文书吏员：从内史到御史到尚书的历史嬗变	75
三、吏的主要特征	76
第五节 两周时期官府文书的行政功能	77
一、礼书的行政施政功能	78
二、法律文书的行政施政功能	80
第三章 战国时期的藏书	83
第一节 图书的产生	83
一、图书的起源	84
二、从档案到图书	86
三、从档案到图书的具体路径：以孔子整理六经为例	88
四、六经为什么是图书：再论档案和图书的本质区别	91
五、先秦文献的三大类型	92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官私图书	96
一、官藏图书	96
二、传世文献所见私家藏书	96
三、出土简帛所见私家藏书	98
第三节 出土简帛所见战国时期私家藏书的基本特征	115
一、传抄是出土简帛文献的本质	115
二、从“传抄什么”看战国文献的集藏方式	116
三、从“怎么传抄”看战国文献的整理方式	121
第四章 秦朝的藏书	126
第一节 秦朝官府文书的庋藏机构	126
一、秦朝中央政府文书的“三副”	126
二、丞相府	127
三、御史府	129
四、尚书台	131
五、内史	132
第二节 秦朝官府文书及其整理	133
一、秦朝行政大军中的文法吏	134
二、秦朝上至丞相御史下及普通官吏皆掌有法律文书	136
三、秦朝海量文书的形成及其保管	137

四、秦朝官府文献整理的对象主要是法律文书	141
五、秦朝律令文书的摘抄	142
第三节 秦朝的官府图书	143
一、秦朝官府图书的研究现状	144
二、秦朝官藏图书的概貌	145
三、秦朝官府藏书中的博士藏书	147
第四节 出土简帛所见秦朝的私家藏书	150
一、关于墓葬所属时间	152
二、关于墓葬所属地点	153
三、墓主(藏书家)分析	153
四、秦朝私家藏书的内容及其文献分类	158
第五章 西汉时期的藏书	163
第一节 西汉时期的官府文书	163
一、丞相和御史	163
二、尚书	165
第二节 西汉时期法律文献的整理	171
一、萧何次律令的校讎学义例	172
二、韩信、张苍、叔孙通文献整理的法律内涵	175
三、《汉律》六十篇、《汉令》三百余篇以及法律专科目录的编制	178
第三节 西汉时期的官府图书	183
一、西汉时期的博士及其藏书	183
二、西汉时期的其他官府藏书系统	190
三、关于刘向“校中秘书”	194
第四节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的对象及其校讎学思想的渊源	202
一、图书是刘氏父子文献整理的唯一对象	202
二、刘氏父子校讎学思想的渊源	206
第五节 西汉时期的私家藏书	213
一、传世文献中的西汉私家藏书	213
二、出土简帛中的西汉私家藏书	215
第六章 东汉时期的藏书	224
第一节 东汉时期的官府文书	224
一、东汉的尚书	224
二、兰台及兰台令史的出现	229
三、兰台和尚书作为文献度藏机构的分殊	230
第二节 东汉时期的官府图书	232



一、博士与文吏的合流	232
二、兰台令史及其职掌	236
三、专职馆员（校书郎）的出现	239
四、专门藏书管理机构（秘书监）的出现	241
五、专门藏书机构（东观）的出现	241
六、藏书格局的变迁	244
七、东观的主要职掌	246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私家藏书	248
一、传世文献所见东汉私家藏书	248
二、传世文献所见东汉私家藏书的特点	250
三、出土文献所见东汉私家藏书	251
四、出土文献所见东汉私家藏书的特点	253
第七章 魏晋时期的藏书	255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官府文书	255
一、中书省	256
二、门下省	257
三、三省的形成	258
第二节 魏晋时期的秘书监和官府图书	258
一、秘书监及其沿革	258
二、著作郎	263
第三节 魏晋时期的私家藏书	265
一、私家藏书的概貌	265
二、私家藏书的特点	269
第八章 简帛文献的传抄	273
第一节 作为传抄本的简帛文献	273
一、传抄是简帛文献最根本的特征	273
二、古代抄手	274
三、抄写即创造	276
第二节 简帛文献的传抄内容和传抄方式	280
一、传抄什么	280
二、怎么传抄	282
第三节 传抄中的简帛文献整理：兼与孔子、刘向文献整理之比较	296
一、定本意识和“自用抄本”	296
二、主体意识和客观原则	299
三、文献整理由分到合的大致走向	300
后记	302

第一章 绪 论

自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故城发现第一批汉晋木简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重要简帛材料的发现,简帛研究不仅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界(如历史学、语言文字学、哲学、文学、民俗学)的重视,也成为自然科学界(如中医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的关注重点,著名学者李学勤甚至提出了根据出土简帛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命题。可以肯定,出土简帛对于中国早期藏书的研究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节 出土简帛在中国早期藏书研究中的价值

“榘轮不成,何来大辂?”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相应地,学术研究的精进亦往往直接取决于学术材料的更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①傅斯年指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②陈寅恪亦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③

从“材料”的角度来说,百年来,出土简帛被赋予的最大学术使命就是寄望于利用新出简帛,“重写中国学术史”^④。学者们不懈陈辞:“我曾再三说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A].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07

② 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J].历史研究,2001(3):29-44

③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A].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6

④ 李学勤.重写学术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过,由于简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①;“简帛书籍的发现,对学术史的研究意义尤为巨大,使得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②。我们知道,所谓“学术史”主要是记载在文献上的学术演化历程,相应地,“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底气主要来自于出土简帛的文献学价值。

和传世文献相比,出土简帛要么是失传有年的古籍佚书,可以从“全面性”的角度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因而能够解决许多传统学术研究中“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要么虽有传世文献相对照,但由于出土简帛长期埋藏于地下,没有经过因反复传抄、翻印甚至“校勘”而导致的内容“失真”,因而可以从“准确性”的角度订正传世文献的讹误。这样,当作为“依据”的文献在“全面性”和“准确性”上获得突破,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在“全面性”和“准确性”上的相应性的精进也就显现为水到渠成之势。

正是基于简帛在文献学意义上的重大学术价值,“出土简牍和帛书的研究,一百年来,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的一门‘显学’”^③。

同样,迄今为止的有关中国早期藏书的研究结论主要是通过传世文献材料而获得的。出土简帛也完全能够从材料之“全面性”和“准确性”的角度弥补单纯基于传世文献研究的不足。总体而言,出土简帛在中国早期藏书研究中的价值,其荦荦大者盖有如下数端:

一、中国早期作为藏书对象的“图书”主要是以简帛为载体的

简帛是中国早期图书的主要载体。作为和传世文献相对的文献学概念——出土文献——主要是指从地下发掘的甲骨、金石、陶泥、简帛乃至敦煌写本等古代文献材料。其中,“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编,如同今日的书册册叶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其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竹简木牍仍继续用作书写”^④。当然,与简牍并行的书写材料还有帛书。例如,“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⑤,说明西汉刘向典校中秘所得“新书”皆先书之于竹简,定本则

① 刘乐贤. 简帛学术文献探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李学勤总序

② 沈颂金. 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15

③ 沈颂金. 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陈其泰序

④ 钱存训. 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 [M].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8: 55

⑤ 吴树平. 《风俗通义》校释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409

书之于缣帛（即所谓“上素”）。扬雄《答刘歆书》忆及《方言》的编撰过程曰：“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槧，二十七岁于今矣。”显见，扬雄《方言》的原始语料也是记录在“油素四尺”上的。

总之，简帛是中国图书的最初载体，从出土简帛出发，有助于勾勒中国早期藏书的真实面貌。李零指出：“中国的记录文字主要是简帛类的文字，纪念性文字主要是金石类的文字。”^①放眼世界，各国古文献多可分为纪念性的（monumental）和记录性的（record）两种，它们在书写材料、内容和目的上区别甚严。例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分两种，一般记录商务和政务的文字，是用削尖的木棍和芦苇书于泥版；而纪念性的文字，则是用刀凿刻于石头、象牙、金属和玻璃等坚硬材料上。古埃及，它的圣书体是宗教礼仪性的文字，主要用于庙堂或陵墓，也是刻在石头上（或刻在陶器上），字体比较规整（或译“碑铭体”）；而僧侣体和人民体，多用于政务、商务或私人通信，以及科学讨论、文学创作，则主要是用毛笔或芦苇做成的笔，蘸黑墨或红墨钞在纸草上，字体比较潦草。玛雅文字，也是分为两类，一类是碑铭，一类是用毛笔写在树皮纸上”^②。

相应地，迄今已知最早的国外图书馆也是以收藏记录性的“软”材料文献为主的。例如，公元前三千年前的埃及图书馆所藏多为写在纸草（Papyrus）上的文本；公元前七世纪巴比伦尼微图书馆的资料则是刻在泥片（Clay Tablet）上的记录；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图书馆所藏乃是书写在贝叶（Pattira）上的文献。

从这一意义上说，简帛（尤其是竹简木牍）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主要载体，中国早期作为“图书的馆”的图书馆应该是“简帛的馆”。因此，至少就目前的考古成就而言，可能见到的中国最早藏书只能追溯到有简帛出土的最早年代：战国早期。当然，正如王国维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③由于简帛不像金石、甲骨等“硬材料”那样易于保存，因此，我们“业已”见到的最早藏书并不一定是历史上“真正”最早的藏书。

不管怎样，从简帛文献出发有助于认识中国早期藏书的原初形态。古谚曰：“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④它深刻地指

① 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42-43

② 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43

③ 王国维. 简牍检署考 [M]. 胡平生, 马月华,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

④ 方回《山经》引《相冢书》，见明杨慎《古今谚》，清《函海》本